

上 编

日本人自我  
认识的历程



## 第一章

# 古代日本人的自我认识

### 一、中华文明圈中的日本

日本民族居住的日本列岛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和朝鲜半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隔海相望，与东南亚的群岛一起星罗棋布在浩瀚的太平洋之上。远古时代的日本人的祖先从大陆北方和南方陆续进入日本列岛，成为那里的最早居民。从此之后，大陆的移民不断来到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文明。

古代的中国和日本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公元前一两千年，在日本还处于石器时代，人们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仍然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的农耕社会，相继建立起夏商周古代国家，创造出高度灿烂的华夏文明，并向周边扩散，形成了中华文明圈。显然，日本人的祖先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差距，产生了对中华文明的仰慕，不断吸取中华文明，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约在公元前3世纪，日本社会突然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水稻和使用金属工具，进入了农耕社会。这比中国大约晚了六千年。而且，水稻种植本来发源于大陆，虽然现在的研究还不能确定它是如何传入日本的，但同时期中国的一个史实为解开这

个疑问提供了可供思考的线索。据《史记》等史书记载，大约与日本进入农业社会同时期，秦始皇派遣徐福率男女三千人，携带五谷种种，百工同行，人海求仙药，“得广泽平原，止王不来”。徐福究竟到达了哪里，在什么地方“止王不来”，广泽平原指的是日本吗？这些问题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历史之谜。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徐福的确到达了日本。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跳跃式地完成从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转变，很有可能是因为徐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掌握了这种技术的人员。

可以说，古代日本人处于中华文明圈内，必然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愿意吸收中国文化并体验到吸收中国文化给自身发展带来的好处。同时，日本的地理位置恰恰为其吸收中国文化提供了保障。日本距朝鲜半岛的最近距离为 200 公里左右，不足以妨碍人员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但它又是一道天然屏障，使得大规模军队越海作战十分困难。这样，日本人可以不必担忧外来的入侵，放心大胆地吸收中国文化。

从公元 1 世纪到 5 世纪，日本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阶段，先是建立了以邪马台国为代表的众多部落联盟，后是由大和国统一了日本。在这一阶段，都出现过向中国纳贡称臣的情况。例如，《汉书》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三国志·魏书》记载：“倭国女王倭弥呼遣使奉献”。南北朝时期，大和国 5 个国王先后向南朝贡献方物并请封。

从表面上看，似乎中日之间的关系不平等，但实际上双方是平等的。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形成了华夷秩序的观念，也就是把自己看做文明的中心，视周边民族为落后愚昧的蛮

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把日本称为“倭”。《汉书·地理志》记载日本称“倭人”此后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和《隋书》都列出专传《倭人传》、《倭国传》。但是据《尚书》的记载，华夷秩序的模式是这样的：‘天子之国以外分为“五服”，“五百里甸服”，再“五百里侯服”，再“五百里绥服”，再“五百里要服”，再“五百里荒服”。“要服”者；“要结好信而服从之”。“荒者政教荒忽”。蛮夷在后两个五百里之中，实际上不受天子之国的控制和干预，甚至“来者不拒，去者不禁”<sup>①</sup>。日本属蛮夷之列，其实质上的平等显而易见。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天子之国也不具有实施控制和干预日本的军事能力。

有趣的是，不仅中国把日本称为“倭”，日本也这样自称。“倭”字带有“委琐”的含义，从华夷秩序的角度，中国这样称呼日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也这样自称，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大概正是出于这种自我认识，邪马台国向汉朝称臣，以便借助强大的汉朝的威望，与周边其他部落联盟争雄。大和国家更是着眼于当时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称臣以换取南朝刘宋诏封都督朝鲜半岛诸国军事的称号，把朝鲜半岛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

此外，称臣纳贡在经济上对日本也并不是不平等的，甚至可能是获利的。因为中国古代不是单方面地接受纳贡，朝廷要以赏赐的形式给予纳贡国物品，很多时候比贡品还要多。例如，公元 239 年，邪马台国向曹魏献男奴隶 4 人，女奴隶 6 人，班布 2 匹 2 丈，而得到的赏赐有各种布帛 153 匹，金 8

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 年，第 84 页。

两，刀 2 口，珍珠、铅丹各 50 斤等大量物品。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日本是因为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差距，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而纳贡称臣的。

## 二、民族意识的萌发

大和国家兴起后，东征西讨，逐渐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国家体制初步建立，民族独立意识也随之增强，因此想要争取在形式上也与中国对等。

7 世纪初，日本恢复了中断了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其国书云：“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采取了和中国完全对等的方式，日本国称谓即出于此。当时的史书分析了日本改变国名的原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

隋炀帝看了日本的国书后很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隋朝没有中断和日本的交往，第二年仍派遣文林郎裴世清出使日本。对日本的称谓也逐渐改变。在《旧唐书》中既有《倭国传》，又有《日本传》，而从《新唐书》以后，一律称为《日本传》。

由此，中日两国之间没有了册封关系，在形式和实质上完全平等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两国之间没有先进和落后的差距。据《隋书》记载，裴文清到达日本后，“其王与清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于海

隅，不闻礼义，……冀闻大国惟新之化。’”<sup>①</sup> 这段记载恐怕不是日本方面的谦逊之词，至少反映了当时中日之间的差距。

中国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日渐臻熟，到唐代达到高峰。而同时期的日本还处于国家体制完善初期。据学者的研究，当时原始社会的氏族势力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天皇还没有绝对的权威，形同于氏族联盟的首领，重大问题要召集氏族酋长会议来议决。此外，在文化上双方的差距也相当大，日本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日本在平等的基础上掀起了大规模向中国学习的热潮，多次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说：“日本有识之士，由于遣隋使而一度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些以后，决不会就此满足，必然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遣唐使表面上始终是敦睦邻谊，但实际上输入唐朝的文化产品却是主要目的之一。”

木宫还提出，当时遣唐使到中国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日本驶向朝鲜半岛，然后沿海岸线航行；另一条直接横渡东中国海。无论哪条航线，都是相当危险的。古代航海的安全性与天气和船本身的构造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人们的气象知识还很贫乏，“至于船的结构，现在已无图样可考”，“总之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一旦触礁，或因为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遇难的事时有发生。此外，“遣唐使一行一面以日常不习惯的干粮、生水勉强充饥，一面经受风吹雨打，波浪颠簸，在海上连续航行数十日甚至数月，一定非常艰苦。而且往程大都是在六七月最炎热的时候，中途病死的当不

<sup>①</sup> 《隋书·倭国传》。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2页。

在少数。”冒这样大的风险，置生命于不顾，也要到唐朝学习，其精神令人钦佩。如果没有正确的自我认识，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恐怕难以做到这一点。

经过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模仿唐朝的政治体制，完备了自己的国家体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古代天皇制国家。同时，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包括日本的文字。由此可见，正确的自我认识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到公元 9 世纪，一方面因为日本的学习已经取得成效，另一方面唐朝逐渐衰落，失去了吸引力，遣唐使的派遣中止。但是，这只是国家组织的大规模学习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消失，也不意味着日本人完全改变了对自身落后的认识。相反，向中国的学习仍在继续。

### 三、古代自我认识的顶峰

13 世纪以后，日本进入了幕府时期，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等几个阶段，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时断时续。

在幕府时期，日本人自我认识的主要参照对象仍然是中国，出现了两种趋向。

一种是继承了上一时期的传统，意识到双方的差距，继续向中国学习。在幕府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日本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生产不发达，长期不铸造货币，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代的铜钱。因此，两国的贸易关系一直没有中断。为了保证能够进行日中贸易，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将军甚至一度

甘愿向明朝称臣。

在文化方面，日本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时日尚浅，没有形成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远远无法和中国的儒学相比。即使是早已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也不如中国根深叶茂。所以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期，到中国来的日本僧人源源不断，通过佛教汲取中国文化。正如木宫泰彦所说，当时的僧人“承袭前代遗风，崇拜中国，向往中国文化”。到了江户幕府时期，儒学兴盛。将军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学者，任用日本朱子学的创始人林罗山为侍讲，顾问幕政。朱子学成为了官学，而且广泛在民间传播。幕府推崇儒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尚没有成熟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理论，儒学，特别是朱子学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当时尊崇儒学之风兴盛。林罗山称赞朱熹说：“儒门第一集成功。道统传来垂不穷。”朱子家风慕二程，千年道统有谁争。”崇仰之情溢于言表。经过江户时代的普及，至今儒学还是日本人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

在幕府时期，另一种自我认识的倾向是不适当地拔高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一个民族总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实事求是地自我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日本在古代很长一段期间落后于中国，但不等于说日本没有自己的优秀之处。问题在于，到底日本民族的优点是什么，能不能把自视为优点之处绝对化而贬低其他民族？幕府时期日本人自我认识的偏差也就出在这里。它的典型代表是 14 世纪公卿北畠亲房所写的《神皇正统记》。该书记叙了自天照大神以来的皇统的历史，认定天神开国、天孙统治只有日本才有，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由此宣称“日本乃神国也”。

书中所说的天照大神等等，始于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也是天皇家族没有统治全国之前、还是众多氏族中普通一支时的

图腾崇拜和创世记。经过大化改新，确立古代天皇制时，为了给天皇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官方于 8 世纪初组织编纂了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天皇家族的创世记变成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创世记。书中说，居住在高天原也就是天上的天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创造了世界，其后代天照大神负责治理高天原，成为最高的神。他派遣他的孙子即天孙离开天上去统治日本。天孙的后代统一了日本，做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客观地说，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记来解释世界和自己是怎样诞生的，神话色彩都很浓厚。在当时，用天照大神的故事来解释日本的历史是十分正常的，日本人也主要是把这个神话当作自身诞生的解释而已。只有一部分人把这个神话传说当作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根本特征，认为只有日本是神创建的、由神的后代统治的国家，形成了早期的神国思想。

公元 13 世纪后期，元朝军队挟蒙古族征服欧亚辽阔地区之威，两次进犯日本。日本朝野上下，一片震惊，纷纷求神保佑。但是，意外的台风和暴风雨使元军的兵船损失惨重，不得不中止侵略而返。一时之间，暴风雨被说成是“神风”，日本的胜利被说成是“神佑”，神国思想陡然高涨。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就是这些神国思想的汇总。这时的神国思想已经越出了早期单纯的神话传说性质，带有明显的与其他民族比较的成分，错误地把神话传说当作真实而加以相信，并认为这是日本民族举世无双的优秀特征，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

到江户时代，国学兴起，本居宣长为国学集大成者。国学最初是文学上的复古运动，有人把它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国学后来带有浓厚的神国思想和排外主义倾向。本

居宣长相信古代传说是绝对真实的，确定国学的任务是探求和恢复日本固有之道，也就是“皇神之道”、“真神之道”，是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开始的，经过天照大神，传到历代天皇的“道”。由于站在神国思想基础上的日本民族优秀论和日本文化优秀论的立场上，本居宣长排斥外来文化，要清除日本文化中儒学、佛教的影响，使日本文化更加纯正。本居宣长对日本民族和文化本质特征的认识是错误的，把子虚乌有的神话当作日本民族的特征，自认为因此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且，本居宣长要清除早已融入日本文化之中、成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儒学和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是极端民族主义排外情绪的异想天开。当时日本与外部世界接触不多，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没有形成，人们的认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宗教意识的束缚，这是本居宣长认识日本民族时产生偏差的主要历史根源，因此我们不必苛责本居宣长。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国学强烈的日本民族优越论给后世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6世纪西风东渐到达了日本，日本开始和欧洲人接触，扩大了日本人的视野，自我认识的参照物增加。如何看待欧洲人，与之相比日本人有什么特点，在世界中日本处于什么位置，成为日本人自我认识的新问题，由此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模仿中国华夷秩序的思想，把欧洲人视为“南蛮”，进而和国学思想结合，宣称在世界万国之中，惟独日本是“真天子”统治，“皇朝”胜于万邦，是世界万国之本，天皇是“万国总帝”。这种思想后来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称霸世界的思想支柱。另一种观点认识到，日本有落后于欧洲的一面。例如日本最早的西洋画家和洋学者司马江汉就说过：“吾日本开辟甚近，故人智浅，思虑不深，人工（指技术）不

及欧罗巴。”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产生了了解和学习欧洲的学问——兰学，奠定了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走现代化道路的基础。第三种观点客观地把日本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认为日本只不过是世界万国之中的一个，没有把日本凌驾与其他民族之上。

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过程中才能产生认识自我的要求，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才能形成自我认识。总体上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在与外部的接触过程中开始出现了自我认识，成为近代以后日本人自我认识的重要源泉。但是，当时的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周边国家都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基本上属于同一发展档次，相互之间的差别不大，中华文化已经不能构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冲击，难以产生强烈的自我认识的冲动。同时，日本和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没有对世界市场的需求，缺乏对外交往的经济动因，相互之间的往来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对外部的了解也受到局限，自我认识的需要不足，也难以全面地和其他民族进行比较，加之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人的对外接触有限，其自我认识仅仅是初步的，或者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比较零散肤浅。

## 第二章

# 传统与现代化碰撞下的自我认识

——明治时期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认识是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的。这时，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把日本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原来局限于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观念被打破，极大地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意识到日本是世界众多民族中的一员。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构成了整个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机，也只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摆脱危机。这就使得日本人越出了以往以藩为国的狭隘意识，增强了日本民族的自觉性。这些都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必要的认识基础，能够从民族的角度审视自己。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西风东渐不仅仅是危机，而且也带来了与日本文化以及与日本在历史上长期接触的中国文化都截然不同的西方现代文明。开国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不同于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传入，它是世界整体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持续的、全面的、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全面接触碰撞中最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差异，产生探寻各自特点的要求。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观念方面，都远远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与落后

的日本形成的对比反差极其强烈，传统的自我认识受到冲击。人们不能不在和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究竟日本和日本人是什么，日本人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因此，在日本被纳入到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后，日本人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寻找自我，使得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改变了明治以前零散个别议论的状态，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和研究领域。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明治初年到 1887 年。这一时期日本为了民族独立，以西方为榜样，努力追求现代化。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使日本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现代化。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学者们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深刻反省了日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利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缺点。启蒙学者们的目的不是全面探讨日本人的国民性。他们很少提及日本人的优点，而是偏重于自我批判。在自我批判中，又侧重于反省对权力的盲目屈从。因此，启蒙学者们有关日本人国民性的论述虽多，但还不是以专门的研究为目的，不能全面反映出日本人的国民性，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启蒙学者们的初衷是推动以向西方学习为中心的现代化，并非妄自菲薄。不过，在席卷日本的文明开化潮流中，确实出现了盲目崇拜欧美人、完全否定自己的民族虚无主义。曾担任外务卿的井上馨甚至主张“化我帝国和人民，恰如欧洲邦国，恰如欧洲人民”的全盘欧化主义。

第二阶段从 1888 年到 90 年代前期，是国粹主义的自我认识阶段。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欧化主义使日本人迷失了自我，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于 1888 年成立了政

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主张国粹主义，力图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民族性。他们致力于克服前一阶段自我认识中的偏差，重新挖掘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优点，尝试全面地对日本人加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主张的“国粹主义”是相对欧化主义而言的，不是顽固倒退的复古主义。他们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立足于扬长补短，在发掘日本人的优点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日本人的弱点。国粹主义派弥补了启蒙学者们的不足，正式开启了日本人自我认识的新风。

第三阶段从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到明治末期，是日本人优秀论和国民性反省论尖锐对立的阶段。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经济上进入了蓬勃的产业革命时期，政治上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近代天皇制，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相继打败了中国和欧洲强国俄国。现代化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一扫对欧美的自卑感，自视为“世界大国”，产生了强烈的自负心。明治初年一度遭到冷落而蛰伏的神国思想和国学又蠢蠢欲动，日本人优秀论应运而生。鼓吹日本人优秀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贺矢一。他著述颇丰，1907 年发表了《国民性十论》，引起很大轰动，后来经缩编写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其他还有《国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东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授的远藤隆吉等。在日本人优秀论大肆泛滥的时候，仍然有一部分日本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没有陶醉在日本成为大国的自傲之中。他们继承了启蒙学者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对日本人的缺点进一步进行反省，希望日本人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民。

从上述梗概中可以看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得日本人自古以来民族主义十分强烈，明治时期又处于外部冲击下形成的社会转型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自我认识始终与如何评价西方

文明与日本文化、如何评价现代化与传统纠缠在一起，由此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日本人劣等论、日本人优秀论、国民性反省论和扬长补短论。其中后三个流派影响最大，下面予以重点评述。

## 一、危险的日本人优秀论

日本人优秀论大都批判“对西洋的崇拜”，指责崇拜西洋派否定了传统，把全盘欧化当作达到文明的标准，失去了自尊心和爱国心，也就失去了日本人的资格。远藤隆吉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似乎公允一些，他说“泰西文明对我国有很大影响，今后也将如此无需更言”，不过，“西洋有西洋的特征和长处，东洋有东洋的特征和长处”，“西洋的长处固然应该取之，但西洋的特征却不一定非要取之”<sup>①</sup>。他批评日本人“一度陷入支那崇拜热，再度患上西洋崇拜病。经过日清、日俄两役，渐渐恢复健康，意识到日本我，但犹未能免依赖西洋之弊。不引用西洋人之言则不能安心之事，今日仍屡屡所见，诚令人感叹。”天眼子则激烈得多，他彻底否认了明治维新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路线，“国家单单外表上进步，国民的实质没有相伴，道德标准被打破，国民的精神被惑乱”。

他们都强调回归日本，“特殊的国风国魂是国家的真髓，道德是国风国魂的精粹，千载不灭”，“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

如果仅仅从批判对西洋的崇拜来说，似乎日本人优秀论还

本节引文，除注明者外，均节自远藤隆吉：《日本我》，大空社，1996年和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大空社，1996年。

有一定的道理，好像是在纠正偏差，倡导民族主义，寻找自我。这也正是它在普通民众中大有市场的原因之一。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提出的与西洋相对抗的日本人的精神是什么。

天眼子说：“我国民三千年来身体力行圣人之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贵贱各守其道，互不相犯，贫富各安其所，互不相闻，和乐协合，以至今日”，他特意在书中用大号黑体字写道：“我大日本国民的道德在忠孝节义。”远藤也说：“日本国因为自古以来作为神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日本我的意识颇强。”他列举出在伦理习惯、哲学、宗教、美术等方面的“日本我”在祖先崇拜一章中指出：“祖先崇拜实为日本之根本，且未来应始终不渝。与祖先崇拜同样永不泯灭的是君主思想。”芳贺矢一虽然也提到日本人“缺乏奋斗努力的精神，欠缺雄大豪壮的气风”等缺点，但是他洋洋洒洒举出了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静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sup>①</sup>，把“忠君爱国”放在了首位，实际上他重视的正是“我等祖先之血今日在我等血管中流淌。祖先的遗风尚横亘在眼前。历史和书籍中展示的祖先的事迹不应该单作为过去的故事看待，而应该在现代实行”<sup>②</sup>，他特别强调要遵从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宣扬的“皇祖皇宗的遗训”。可见，日本人优秀论继承了国学的糟粕，它的核心内容是把所谓的“国体”和“国体观念”看做日本人国民性的根本，远藤甚至声称“此日本能卓越地迎来今日之隆盛之原因”。

喜多川忠一：《思考日本人》，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3年，第156页。  
芳贺矢一：《日本人》，大空社，1996年，第206页。